

地理書籍与公牘——地域性政書的出現

(漢語提綱)

日本 學習院大學 大澤顯浩

明代末期由於編寫地理書的質變，出現了新類型的地理書籍——地方官僚行政書籍。博學多識和實用性的追求導致了一些官方情報的公開及利用，超越傳統性的地理書結構，終於呈現了可以稱之為「地域性政書」的地理編著。萬曆時期編寫的『江西輿地圖說』和『兩河觀風便覽』等，就是當時開拓新生面的典型例子。嘉靖年間蒙古和倭寇對策成爲一項重要的問題之後，編輯地理書時軍事和地理的關係的重要性漸被認識。原來方志包含的內容爲某一地方的褒詞，即「佳景，奇跡，名人，勝事」等的表彰，其根據『大明一統志』的「詞章之學」的結構。而政書包含的內容是跟「詞章之學」有鮮明對比的公牘掌故。另一方面，明代末期經世致用的意識促進官方情報得以利用。當時，重視應付實際情況的實用性，所以，因意識到『大明一統志』的「詞章之學」的缺點，以致產生了對『大明一統志』的批判。其後以超越「詞章之學」的結構的形式而利用衙門內部文件。如何整理知識之點，使得編寫地理書的構思產生變化，與以前有差異的地理情報開始得以編寫。可見，例如“吏治評語”的從行政方面來寫的地域評價，填補了地方志尋求的某地的表彰和地域實際情況的隔閡。這種地域性政書的出現，顯示了對地域的意識典範的變化。